

GONG GONG
XUAN ZE

公共选择

丹尼斯·缪勒 著 张 军译



公共选择

丹尼斯·缪勒 著 张 军译

(沪)新登字117号

Dennis Mueller

PUBLIC CHOICE

根据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 周瑶明

封面设计 宋珍妮

公共选择

[美] 丹尼斯·缪勒 著

张军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常熟第七印刷厂印刷

1993年1月第1版

1993年1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 插页: 2 字数: 180000

ISBN7-5426-0611-5/F·142

定价: 10.00元

译者的话

公共选择理论是最近四十年来在西方经济学界逐渐形成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由于它是把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工具用于研究政治学的问题，所以公共选择理论也算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经济学”。1986年，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以其在这方面的开拓性贡献一举荣膺该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从此可以说公共选择理论已跻身于现代经济学的殿堂。不仅如此，由于公共选择理论运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考察包括政治领域的集体决策在内的“非市场决策”和“公众选择”，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公共选择理论也发展了现代经济学领域的诸多理论，尤其是非市场均衡和偏好显示等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从经济学最根本的“经济人”假设入手，把政治舞台看成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交易市场，从供给和需求两个侧面着手分析。政治产品（即公益）的需求者是广大的选民或纳税人，供给方则是政治家、官僚和党派。他们的活动无论多么复杂和有差异，但他们的行为则遵循着一个共同的效用最大化的规则。就是说，一个选民在投票前总是要在候选人名单中选

2 公共选择

择那个能给他带来最大预期利益的人，然后才投他的票；一个政治家或官员在决策时总是对那个最能满足他自己利益（如权力、金钱、名誉等）的议案投以青睐，就是说，公众的利益有可能是手段而未必总是目的。记住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是本书的核心内容，这一分析实质上也是对经济学关于公共产品理论的运用和发展。本书以第四、第五、第七、第八共4章的宏大篇幅，运用偏好显示理论、俱乐部理论、垄断理论等经济学理论，阐述了这些内容。

在西方经济学界，公共选择理论已被列入“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的范畴，成为现代制度经济分析的支柱之一。这主要是因为公共选择理论对不同制度下的非市场决策问题有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公共选择理论注重探索不同民主制度下的公众选择在结果上的差异，并研究不同的表决规则（如一致通过、多数通过等）对决策质量的影响（参见本书第三和第六章）。有趣的是，本书作者在第十一章还广泛比较了一致通过规则和多数通过规则的基本假设，并且发现其结果的差异与经济学上的完全竞争市场和非完全竞争市场的均衡差异有着美妙的相似之处。

公共的选择本质上是公共利益如何实现和增进的问题。这一点是公共选择理论与[福利]经济学难分伯仲的又一原因。现代福利经济学研究的就是如何构造并解出“社会福利函数”的问题。在公共选择的理论家们看来，这个问题可以具体化为如何设计或起草公平宪法的立宪问题，它构成了被称之为“规范的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内容，以区别于对政治舞台的其他内容的实证分析。该书的剩余章节涉及了这些内容，重点讨论了个人选择与社会福利之间的“不可能性定理”（即阿罗定理）以及社会契约理论，发展了公平之正义和政治宪法理论，按照这一理

论，宪法改革是限制并扭转政府不合理行为和过度膨胀的主要制度措施。政治宪法理论已成为众多理论家感兴趣的课题而日渐深入。

作为对本书内容高度概括的一个升华，有必要指出公共选择理论的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含义，这就是它向经济学家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经济学家怎样更好地影响政府的公共政策？我想，把这个问号留给读完本书的读者是有意义的，希望本书能把公共选择理论的这个含义明朗化。

本书根据剑桥大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剑桥经济文献综述丛书”之一译出。该书自初版以来已于1980、1981、1982、1985年四次重印，在西方学术界影响甚大。作者丹尼斯·缪勒教授执教于美国马里兰大学经济系，从事产业组织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的教学和研究。本书曾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布坎南和经济学家艾伦·皮科克的高度评价。即使如此，也希望读者带着分析的眼光研读这本崭新的政治经济学著作。

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碰到不少国内尚无规范译法的概念，译者力求体现原意，生硬之虞实属难免。对此我的博士导师宋承先教授给予极大支持和帮助，在此谨致敬意和谢意。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她帮我整理，替我誊清了近20万字的译稿，可以说没有她倾注的心血，我很难顺利完成本书的翻译。即使这样，我仍然对本书的错译之处承担全部责任。

张 军

1990年12月1日于上海

前 言

本书是《经济文献杂志》1976年6月号上发表的一篇综述的某种扩充。那篇文章的全部论题都纳入了本书，只是本书的篇幅更长些。然而，本书所添加的新资料的数量在各个论题之间有相当大的差别。有些论题几乎原封未动，有的则作了扩充和重写，以致很难辨认出它是由原来那篇综述衍化而来的。

当初写作本书的原因之一是为了论述那篇综述中被忽略的或论述不够充分的问题。除了扩充的资料外，本书还新增了那篇综述中根本没有涉猎过的一些论题，例如第四章所讨论的各种新的表决方式，以及第八章讨论的公共福利的供给等。鉴于有关这方面的文献一直以异常迅猛的速度涌现，这里涉及到的可能仍过于简略，在经历了若干年之后更是这样。

本书大体上还是依照那篇综述的格局来写的，当然，有些内容作了调动。多数通过规则的规范讨论现已放在第二部分，该部分还讨论了其他规范性问题。经验论证和它所要检验的各个理论假说被放在一起讨论，而不是分开论述。尽管这样，一般来说，假如有人读过那篇综述，他就会发现本书的基本框架是

他所熟悉的。

虽然本书的篇幅较大，论述面也更为全面，但读者应该记住，本书和那篇综述一样，依旧只是对这类文献的一个综述。在阐述本书的各个主要观点时，我一直力图使读者不必查考原始文献就能弄懂它们，但本书不应该被看作是对综述到的那些文献的一种替代。相反，本书的主旨是帮助读者充分理解每个论题，使他能够更深入地研究那些他最感兴趣的论题。倘若本书真是成功之作，那它将充分唤起读者的兴味，引导他继续研究其中的一些文献。

对于那些熟谙这里综述到的文献的读者来说，我希望书本能对他更好地理解这些文献有所帮助，并能使他注意那些他过去不熟悉的观点和著作。我无意说，本书已包含了所有的有关文献，就是那些已经涉及到的文献，在材料的取舍上也难免或多或少地反映出作者本人的“世界观”的影响。这后一种观点不折不扣是经济学家的观点，尽管它明显受到了维克赛尔的某种影响。

出于教学上的考虑，我已力求避免直接陈述别人的原话，在引用非常重要的观点时，也常常只是用括号或脚注来表明其出处，这样做难以对某些文献的相对重要性作出评价，不过我认为这样可以使人们比较容易理解这些文献的意义。我也力求体现出那些文献所具有的开拓性贡献，而其他文献的相对重要性却未必能从参考文献的这种格式中推断出。所以，我再一次要求读者要查考原始资料，对各种资料的优劣作出自己的评判。

我于1974年在伊萨卡开始写那篇综述，1975年完成于柏林。1977年，我在柏林开始写作本书，1978年在华盛顿结稿。在这段时间内，我有幸得到几位友善而宽容的秘书协助工作，尤其是朱迪思·墨菲、彻伊尔·沃利斯以及埃利诺·沃特斯。打印书稿的繁重任务是由国际管理学院的海伦·赛弗特承

担的。我要对她的合作、努力和技能致以衷心的感谢。她大大减轻了我汇总手稿的负担。

我也要向国际管理学院和柏林科学中心对我写作本书的一个重要部分的支持谨致谢忱。是该学院与我签定的合约使我得以从事产业组织方面的研究工作。此外，我非常感谢该学院、特别是它的副院长沃尔特·戈德堡先生，由于他的应允，方使我的一部分精力投入了这一浩繁的工作。

公共选择领域的一些学者善意地对我的文章或本书手稿作了评论。布鲁诺·弗雷、罗伯特·古丁、查尔斯·鲁洛特、史蒂文·斯勒茨基、罗伯特·托里森、亨利·塔肯思和戈登·图洛克等人的意见帮助我改进了手稿的许多不足之处。彼得·伯恩霍兹和艾伦·皮科克认真地通读了全书并提出了详细的修改意见，我对他们十分感激。鉴于本书的性质，其中无疑包含了他们的某些观点。当然，我知道他们不会完全接受我对他们的著作以及这类文献的其他方面的诠释，所以我要忠告读者，这种阐释上的差异是可能的。

最后，我还要向詹姆斯·布坎南深表谢意。他在本书的几个修改阶段中都阅读了本书，并加以评论。我本人对他在修改本书中所注入的时间和精力感激不尽。无论本书取得的成就有多大，都将因他的帮助而更添光彩。

1978年7月于柏林

目次

译者的话

前言

第一章 导言

第一部分：实证的公共选择

第二章	集体选择的各种缘由	11
第三章	直接民主制下的公共选择	19
	一、一致通过规则.....	19
	二、最优的多数.....	28
	三、多数通过规则.....	31
	四、循环.....	38
	五、互投赞成票.....	48
	六、多数通过规则与其他规则的比较.....	58
	七、存在大量选民的直接民主制.....	65
第四章	对公共物品显示偏好的一些新方法	67
	一、通过购买保险显示偏好.....	68
	二、需求 ² 显示过程.....	70
	三、否决投票.....	82

四、三种程序的比较	85
第五章 一般的筹资	89
第六章 代议制民主中的公共选择	97
一、两党民主制的结果	98
二、中位投票人模型的经验检验	105
三、选举规则对政党数目的重要性	111
四、多党制	113
五、各党的联盟——最小取胜联盟假说	115
六、候选人的行为	116
七、代议制民主中的选民行为	119
第七章 退出、呼声和不忠	125
一、用脚表决	126
二、俱乐部理论	129
三、连带供给情况下的用脚表决	134
四、自愿结社、配置效率及分配平等	142
五、革命的理论	145
第八章 政府产品的供给	149
一、作为垄断者的政府	149
二、政府行为的经验研究	151
三、预算最大化的官僚	156
四、官僚相机抉择模型的扩展	163
五、供给和需求的结合	166
六、对官僚极权主义的立宪约束	167

第二部分：规范的公共选择

第九章 真实估价的社会福利函数	173
第十章 公理的社会福利函数	183

一、证明的逻辑	184
二、放松假定	187
三、帕累托自由的不可能性	200
第十一章 多数通过规则和一致通过规则中的各项基本假定	205
一、多数通过规则的梅氏定理	206
二、多数通过规则的雷—泰勒定理	208
三、一致通过规则的基本假定	210
四、两种规则的基本假定之比较	211
五、两个规则应用于“错误”议案的结果	214
六、结 论	219
第十二章 一个公正的社会契约	223
一、社会契约	224
二、正义的两原则	226
三、该理论向其他政治阶段的扩展	230
四、对罗尔斯社会契约的批判	231
五、结 论	241
第十三章 功利主义的契约	242
一、公平的社会福利函数	242
二、公正的政治宪法	253
三、结 论	255
第三部分：规范理论与实证理论的比较	
第十四章 公共选择的规范理论与实证理论的比较	259

第一章 导言

公共选择可以被定义为对非市场决策的经济研究，或者简单地说是经济学在政治学中的应用。公共选择的主题就是政治学的主题：国家理论、选举规则、选民行为、党派政治、官僚体制等等。然而，公共选择的方法却是经济学的方法。像经济学一样，公共选择的基本行为假定是：人是一个自私的、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①这就把公共选择纳入了至少是始于托马

^① 对选举研究中的这种假定的详细验证，可参见唐斯(1957)；布坎南和图洛克(1962)；赖克和奥德肖克(1973)的著作，也应提及J·A·熊彼特对这一假定的早期使用(1950)。公共选择文献中的另一个奇点是熊彼特的著作具有的微弱的直接影响。唐斯声称：“熊彼特对民主的深邃分析造就了我们全部论题的灵感和基础”(1957)。但他只引用了那本书的一页(引用两次)，用来支持“经济人”这一假设。该领域中的其他绝大多数著作没有提及熊彼特。同样，戈登·图洛克就熊彼特对他著作的影响作了如下评说：“就我而言，不可否认他对我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尽管这影响来得很晚。进一步说，虽然我早在1942年就读了那本书，但我写《官僚政治学》(1965)时并未再读它。从这一点看，那本书给了我们政府在政府问题上所指望的一般观点，但并没有任何能够具体援引的详实材料。”关于熊彼特对公共选择领域中其他人的工作也具有类似的影响这一点，我是怀疑的。

斯·霍布斯和本尼迪克特·斯宾诺莎的政治哲学源流以及始于詹姆斯·麦迪逊和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的政治科学源流的范围之中。虽然早期的这些文献有许多有用和重要的东西，而且很多文献预计到了后来的各种发展，但是，我在这里不想花精力将这种早期的著作和现代公共选择文献联系起来，因为它们的另一个突出的特点将它与现代文献截然分开了。现代公共选择的文献使用了经济学的各种分析工具。试图借助于后来者的分析工具来评述这类早期文献，未免太离题了。^①

公共选择作为一个独立领域，它的发展主要是最近三十年的事情。它是对经济学其他方面出现的各种问题和需要作出的反应。从A·柏格森1938年的论文开始，后经由K·J·阿罗1951年的著作(1963年修订)的鼓动，出现了一大批探索社会福利函数或社会选择函数的各种性质的文献。^② 这些文献集中讨论加总个人偏好使社会福利函数最大化，或者满足一些规范标准的问题，也就是讨论在已知单个选民偏好的情况下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社会状态。对最优加总方式的这种探索自然就激发起人们研究通过选举规则来加总个人偏好的实际程序所具有的各种性质的兴趣，即研究在不同的选举规则下对给定的偏好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结果这一问题。寻求一种能满足某种规范标准的社会选择函数的问题最终被证明和在不同的选举规则下建立均衡十分相似。所以K·J·阿罗对社会福利函数的研究(1963)和D·布莱克对委员会选举程序的开拓性研究工作都是建立在J·C·德·博尔达(1781)、M·德·孔多塞(1785)以及

① 不过，可以参见布莱克(1958)，布坎南和图洛克(1962)，哈非勒(1971)，奥斯特罗姆(1971)等人的著作。

② 关于这方面的各种综述，参见森(1970a, 1977a, b)，菲什伯恩(1973a)，普洛特(1976)，凯利(1978)等人的著作。

C·L·道奇森(即刘易斯·卡罗尔, 1876)的著作的基础上的。我们把社会福利函数文献中最直接相关的各个部分放在第二部分即规范的公共选择中来讨论。

经济学促进对公共选择研究兴趣的第二个发展是对各种市场失灵的研究, 这种研究成果也是来自 20 世纪 40 年代和 50 年代出现的论文。这种研究集中于确立当存在公共物品、外部效应和规模经济时进行有效配置的条件, 它直接导致了对在这些情况下显示各种个人偏好的非市场程序的研究。公共选择对非市场决策的研究方法是: (1) 作出与一般经济学相同的各种行为假定(理性的、功利的人), (2) 常常对偏好显示过程作出类似于市场的描述(选民从事交换活动, 通过各个投票者显示其需求, 公民退出或加入俱乐部), (3) 提出和传统的价格理论一样的问题(均衡存在吗? 它们稳定吗? 是不是帕累托有效率的? 它们是如何达到的? 社会的各种经济功能是如何运作的?)。这部分文献和实证经济学十分相像, 因而在这里被当作实证的公共选择, 尽管其中有一部分具有规范的涵义。实证的公共选择将在第一部分加以述评。

“大陆”学者在公共财政方面的研究是公共选择理论和公共支出理论的共同先驱。^① 其中 E·林达尔(1919)和 K·维克赛尔(1896)的论文在这里特别重要。林达尔的文章对公共物品理论影响较大, 维克赛尔则对公共选择和公共财政理论有较大影响。维克赛尔把政府看作公民之间交换的某种补偿过程, 这一观点成了詹姆斯·M·布坎南和戈登·图洛克的《一致的计算》(Calculus of Consent, 1962) 一书以及其他大量实证的公共选择文献的基础。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1959)把政府的活动

^① 参见马斯格雷夫和皮科克(1958)汇编的论文。

划分为资源配置的决策和收入再分配的决策是很有影响的，这种划分可以直接上溯到维克赛尔。在第三部分，我们将论证，这种维克赛尔式的划分在概念上筑起了横贯在实证的和规范的公共选择之间的自然疆界。^①

有了这一背景，说许多对公共选择作出贡献的学者过去研究的是公共财政，或者是由此起步的，也就不足为怪了。尽管存在着这种重合，公共选择和公共财政的内容大部分还是不交叉的。^②不过本书对此很少谈及。

也许值得指出的是，还存在着其他一些课题，它们可以被认为是公共选择领域的组成部分，但本书略而不论。目前大量涌现的关于法律 and 经济学或者产权方面的文献，本书全未提及。我们也很少论及行政官僚方面的文献，除非它和政府产出的供给有联系（见第八章）。略去这些论题，只是因为时间和篇幅的限制要求我们必须阐述那些被定义为属于公共选择的内容。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们也不会考察来自“左派”和“右派”对公共选择文献的批评。^③我们的重点集中在这些文献的主流方面，它使用并比较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各种发展。

在经济学的学科范围内，用于发展和检验各种理论的方法论上的各项基本规则已经相当完备并为人们所接受。人是理性的动物，他要使其目标函数最大化（或者是使其满意化）。这种

① 与公共选择文献中的这种划分对应的是对国家的各种看法中存在的某种差别，这些观点不是把国家看作一个“有机”实体，就是把它看作一个从事等价交换的个体联盟。1949年布坎南在一篇文章——该文以维克赛尔的观点为基础——中明确地阐述了这种划分并预示了公共选择文献以后的发展。参见布坎南的著作（1975 b，注解10）。

② J·M·布坎南（1967）与格林（1970）；克莱沃里克和克雷默（1973）的著作是例外。布坎南（1975 b）评述了这一问题并强调了维克赛尔的影响。

③ 关于对“新左派”各种观点的讨论和对自由主义立场的直接表述，见罗利和皮科克（1975）的著作。

目标函数是对一些有确切涵义的变量加以定义的。借助某些相当简单的分析模型，像非合作博弈等研究中所使用的那种模型，就可对个人之间关系的特征加以描述。这些模型都是假设的，但它们因充分接近现实而便于对某些类似的经济行为进行解释和预测，由此它们得到了承认。在公共选择领域里，这种假设常用于解释和预见政治行为。因此，那些用高度简化和抽象的模型去解释和预见政治行为的做法最近受到一些以运用这种模型为传统的人的挑战，也就不足为奇了。^① 政治科学家对作为选民和政客的人的看法总的来说与公共选择中所假定的很不一样。这些角色在其中相互作用的环境通常被假定拥有某种制度上的丰富内容，这些内容也许远远超出了这些抽象模型所隐含的意义。在许多政治科学家看来，公共选择的各种模型不过是一幅天真的政治行为漫画罢了。

公共选择理论家对这些批评的回答，和经济学家们对其“天真”的经济行为模型多年来受到的类似批评所作的回答是一样的。只要这种简单化了的模型在解释政治行为方面胜过其他模型，使用这种简单化的模型就是合理的。就这一点而言，描述民主的各种经济模型所提供的解释能力仍然是可疑的（托伊，1976）。不过，近来已有很多人在努力验证公共选择的民主模型的各个方面，因此，对其相对的优点在近期作出评价应该是可能的。我们将回顾一下迄今为止我们在处理各种理论模型中业已获得的一些经验结果。

有一个经验问题是确凿无疑的。在美国，政府活动的程度已大大提高，并且有增无减。表 1·1 给出了 1902 年到 1970 年间政府支出的一些代表性数字。这些数字生动地显示了政府的

^① 例如，参见麦克弗森(1961)，斯托克斯(1963)，巴里(1965)，托伊(1976)的著作。